

『三让』

将军徐立清

□ 张社卿

徐立清曾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战争时期驰骋疆场、战功卓著，在和平时年代淡泊名利、大公无私，是一位文能提笔、武能上马的优秀领导干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被尊称为“三让”将军，毛泽东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让级别——主动申请由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

我军在战争年代没有实行等级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建立等级制度就显得越发必要和迫切。1951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启动全军干部评级工作，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主抓这项工作。

评级工作复杂敏感，涉及每位干部切身利益。评级工作一开始进展顺利，不少同志发扬风格，主动提出来要求低定。然而随着评级工作深入展开，也有一些人希望高定。针对这种情况，徐立清明确指示要按评级条件办。他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不管是谁，咱们要按条件办，按规定办，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不符合条件，要求照顾的，一个也不能办。”他还说：“我是副部长，如果不把好这个关，工作还怎么做。”

徐立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曾任兵团政委，当时又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按照评级条件应定为正兵团级，原上报军委的报告写的也是定正兵团级。但他说，现在不少人都在为定高级别托关系、找门子，我本人就不要正兵团了，定个副兵团更好些，“在待遇问题上不能总是往高处看”，主动提出申请降为副兵团级。

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都不同意徐立清定副兵团级。彭德怀请徐立清到他办公室面谈此事。徐立清说，我身为干部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彭德怀坚持徐立清定为正兵团级。第二天，徐立清又给罗荣桓写报告说，最好能把正兵团让给别人。罗荣桓不同意，之后彭德怀又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最后，在定级的报告书上，徐立清的副兵团级被改为正兵团级。

让军衔——主动申请由上将军衔降为中将军衔

1953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在军队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1955年2月毛泽东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明确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绝大多数干部对军衔制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的担心军衔评低了面子不



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更有的因要求未满足而闹情绪。面对复杂的评衔状况，徐立清开始考虑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和责任。按规定，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上将军衔条件。可他想来想去，授衔工作要符合毛泽东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还是中将为好。他和妻子党秀玉商量让衔的事，党秀玉明确表态“你要中将我支持你”。于是，徐立清向罗荣桓写报告，要求低授军衔。

几天后，当徐立清看到授予上将军衔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毫不犹豫把名字改到中将名单上。罗荣桓看到名单后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徐立清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上将名单中。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

这时，时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请求把大将军衔降为上将军衔，迷糊中的徐立清认为有了学习榜样，连夜与许光达交流看法。许光达鼓励他说：“一定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于是，徐立清再次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恳求批准低授要求，但彭德怀、罗荣桓没有批准。彭德怀还专门找徐立清当面解释原因。徐立清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后说，不简单呐，金钱、地位和荣誉最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随着授衔日期的临近，徐立清更加寝食难安。他先后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了好几封信，一再表明决心。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亲自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向周恩来汇报了有的争官争位、不顾大局的情况，认为只有自己低授了，才能理直气壮、挺直腰板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反倒被徐立清说服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与徐立清面谈：“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你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最后，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

让职位——主动申请找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接替

1955年7月，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不住院治疗。罗荣桓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泽东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嘛。

这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他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曾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我耽误工作很长时间了，最好找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接替。”在罗荣桓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提出找人接替自己的想法。

1956年初，一些部队干部缺额数很大，干部配备任务很重。徐立清知道情况后，几次要求出院，但医生都没有同意。同时，徐立清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即使出院也不能参加正常工作。于是，在医院的病榻上，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的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但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写信请求让位，他说：我已住院很久了，不见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思想上极感不安……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这样比较适合我。彭德怀收到信，和罗荣桓商量后，要徐立清以养病为主，少考虑工作，是退是留由组织上安排确定，让位的事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陕中战役：解放西北的重要一仗

□ 杨 斐

陕中战役，是第一野战军为解放陕中地区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追击战役。此役共歼灭胡宗南及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各一部共3.5万余人，古都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连续快追快打，自主协同歼敌，解放古都西安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我军编制更加统一合理，战斗力持续增强。长期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集团、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在我军连续打击之下，实力不断削弱。1949年4月24日，华北重镇太原解放。早有准备的胡宗南随即于26、27日将其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撤退，形成跨泾河、渭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与青宁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随时准备退居陕南、川北。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打击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尽量截缴其军用物资，保护西安不致被敌破坏，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陕中战役。

其原定作战部署是：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视情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后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又考虑到青宁二马可能配合胡宗南集团行动的复杂情况，一野首长研究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抓住胡宗南部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

5月17日晨，胡宗南部先我行动而全线撤退。第一野战军各军迅即按计划发起的追击。追击战斗中，各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顾跋山涉水和饥饿、疲劳，夜以继日地长途猛烈追歼敌军，并主动与友邻部队联系协同，发现有利战机即迅速投入战斗。第四军连夜百里急行军，追歼向凤翔逃窜的敌第五十七军。刚刚赶到岐山的第一军第二师闻讯而动，不顾疲劳，25小时急行军20公里，抢占了凤翔东北高地老君岭，切断敌人退路，协同兄弟部队全歼该敌。

5月18日下午，第六军从三原县大程镇出发渡过泾河，急速向西安挺进。20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突破敌渭河南岸防线，全军渡过河，直逼西安城下。当日上午11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撤出城防，我先头部队第十六师四十九团顺利由西门进入西安市区。战至14时，第六军完全控制西安。22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入城式，标志着古都西安正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战至24日，我军解放了宝鸡以东、渭河南

北的广大地区，共歼敌2.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胡宗南不断收缩兵力，退居秦岭。陕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华北两大兵团入陕，西北敌多我少局面彻底改观

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第十八、十九兵团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两支劲旅。接到命令后，两大兵团各部队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政治教育，配齐物资装备，做好了由晋入陕的充分准备。5月26日，第十八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等兵团首长率领下，开始从太原出动，经风陵渡西过黄河，向陕西关中地区进发。至6月24日，第十八兵团全部集结于西安附近。第十九兵团于6月初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等兵团首长指挥下开进，最终于7月3日在各自指定地区集结完毕。两大兵团从先头部队出动到集结完毕共历时一个半月，广大官兵冒酷暑、战疲劳，车运、船运、步行多管齐下，行程约1000公里，胜利完成了由晋入陕的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要把迎送和支援大军西进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全力做好各项战勤工作。据统计，仅晋南地区即筹粮910余万公斤，草245万公斤，油肉菜等40万公斤，柴炭430万公斤，动员工夫16万多人，牲口16万多头。部队每到一处，百姓夹道送子弟兵，给战士送鸡蛋、戴红花；指战员不顾疲劳，帮助群众挑水、磨面、收麦子，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活剧。所属部队归建一野后我军在西北地区总兵力达到40余万人，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多我少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变。

转攻为守，诱敌深入，粉碎胡马联合反扑

就在两大兵团西进的同时，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纠集优势兵力，联合对第一野战军发起反扑。陕中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西安解放之后，我第一野战军主力已进至西府地区，逼近宝鸡，马步芳、马鸿逵驻地甘肃、宁夏受到严重威胁。青宁二马于5月底就开始向陕甘边境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并以一部偷袭西安，然后主力越泾河，在三原及以北地区与解放军决战。蒋介石电令胡宗南与

胶东抗大的斗争精神

□ 陈兆宽

在山东省栖霞市有一所革命红色学校——胶东抗日军政大学（简称胶东抗大）。她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的师生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穿过陕、晋、冀、鲁4省，历经艰难险阻，行程数千公里，于1940年4月到达胶东抗日根据地，在10年的战火硝烟中孕育了“在熔炉中锤炼、向斗争中学习”胶东抗大的精神。

在思想淬炼中激励斗争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抗大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找准办学定位，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战火硝烟中走流动办学、学战结合的道路，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一万多名干部，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自我反省、不断学习是干部成长进步的必要途径。在战争气氛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胶东抗大学员们仍然静下心来，在背包上认字，在大地上写字，把大路当课堂，把膝盖当桌子，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胶东抗大师生学习，以求知若渴的态度、与时俱进的品格，时刻保持本领恐慌、谨慎清醒的赶考状态。胶东抗大的教风极为严格，在教学管理上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自我革命。1945年2月，胶东军区组织莱阳万第战役中俘虏的200名连以上军官到胶东抗大学习集训。集训结束结算时，排长发现账上少了5张蜡纸，想用自己的津贴买5张蜡纸赔补，指导员听取汇报后严肃指出，“必须彻底查清，找出原因，不能马虎了事”。最终查到了“两个班各领5张蜡纸”的记录，发现“只看到‘5’字，却忽略了‘各’字”的错误。指导员严厉批评教育：这不只是5张纸的问题，应从

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上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做任何事情，必须认真负责、不留尾巴。正是这种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魄力，才保持了良好的学风、教风。可以看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鲜明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

在政治历练中锤炼斗争意志。胶东抗大所锤炼出的斗争意志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立场坚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战争环境中，胶东抗大坚持理论传播、狠抓理论教学。革命读物稀缺，就组织教员缮印；教学教材缺乏，就结合实战编写；纸张油墨匮乏，就突破封锁寻找；没有印刷所，就自力更生创建。先后编印《斗争》《先锋》《洪炉》等多部理论书籍、刊发多篇理论文章，为战争中涵养斗争精神提供强大理论支撑。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切实培育思想之“元”、补足精神之“钙”，做到理论上学深悟透、思想上深信不疑、政治上坚定不移。二是作风硬朗。在抗战最艰苦时期，胶东抗大学员始终坚定信仰，团结一心克服艰苦条件，发扬了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由于服装严重短缺，冬天有的学员把穿破的夏装当衬衣，大多数学员只能空身穿一件棉衣，被戏称为“套筒棉衣”。女学员由于没有衣服换洗，只好几个人将津贴凑起来买几尺布缝一件衣服轮流穿着换洗。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激励着每一位学员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风云变幻看定力，沧海横流显本色。越是复杂的形势、困难的环境，越需要党员干部坚持原则、保持定力，坚守初心、经住考验。新时期的党员干部也要发扬斗争精神、锤炼斗争意识，越是

艰苦环境、繁重任务，越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三是纪律严明。时任胶东抗大校长的贾若瑜，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坚持事无大小，严格按制度规定办事，不搞特殊，防范政治风险。1941年，一次胶东抗大转移途中，贾若瑜发现爱人将一个小包裹放在自己乘马的背套里，立即让警卫员送给爱人，要求她自己带，并严肃告知身边人：“今后不准让她向里面放东西。她个人的东西，让她自己带嘛，不要搞特殊！”。新时期的党员干部面对歪风邪气，要敢于举旗亮剑、动真碰硬，只有这样才能永葆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本色。

在实践锻炼中夯实斗争本领。胶东抗大在重大斗争中，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在革命的实践中夯实了斗争本领。坚持战场练兵。胶东抗大师生面对敌伪顽疯狂扫荡围剿的严酷现实，坚持把战场作课堂，在枪林弹雨中求生存、长本领，总结出了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实战经验。强化责任担当。担当本领是否过硬，是检验党员干部政治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胶东抗大教员、指导员洪国治恪尽职守、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时常咳血，别人害怕，他便讲：“没关系，干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吐点血怕什么！”他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听取学员意见，精心备课，改进教学。1945年2月，年仅29岁的他与世长辞。洪国治用生命书写了责任与担当，以自身为范本教育学员们在实践中强化政治责任，增强斗争本领。占据舆论高地。胶东抗大文艺宣传队在办学过程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配合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深入各地宣传发动，发挥号角作用，激励战士们不断前进。

